



半空 还是半满

在索马里的柏培拉，援助人员正走过堆积的援助食品袋。

Andrew Berg 和 Luis-Felipe Zanna

人们对外国援助是否有助于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争议。虽然有证据表明援助对婴儿死亡率和小学入学率等社会指标有正面影响，但它对经济增长能产生多大效力尚未形成定论。对此，Rajan和Subramanian（2008）作出总结：“要想发现援助对增长产生任何系统性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而Arndt、Jones和Tarp（2009）则发现“援助在较长时间内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积极的、统计意义上的因果效应”。

争议较少的观点是，援助流入，尤其是援助的大量涌入，在给受援国家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援助的大量涌入可能会诱发实际汇率的上升，这将给对于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出口行业带来危害（见Rajan和Subramanian, 2010），但这些援助或许有助于资助基础设施所急需的公共投资，而这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见Collier, 2006）。这种喜忧参半的实证依据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可能取决于各国特定的因素，诸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响应、援助的用途、公共投资的效率以及经济的各种结构性特点等等。

情形评估

在IM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联合项目中我们采用了这种特定的国家因素的观点，为向几个非洲经济体增加援助的情形进行了宏观经济评估。八国集团(G8)于2005年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承诺：到2010年将非洲的援助提高一倍。IMF应约对与这一承诺相应的情形进行宏观经济评估。这些情形和支出计划是基于UNDP与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各国政府共同作出的部门层级的分析。到目前为止，已经对10个相关国家的情形作出了评估，包括贝宁、中非共和国、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多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今后的几个月内将完成对另外五个情形的评估（其中三个案例可以通过访问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8/091908a.pdf获得；余下案例即将出版）。

这些评估使用IMF开发的一种常见框架（见Berg等，2010）。该框架是建立于一个动态的、小而开放的经济体定量模型基础之

援助能真正发挥作用吗？大量援助涌入产生的净效果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异

上的。由于该模型可以支持更为严谨的政策讨论和宏观经济分析，其对政策制定者和IMF的工作人员都很有帮助。该模型旨在获取一些接受大量援助的低收入国家的主要运作机制和政策上的信息。该框架侧重于研究援助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中短期的宏观经济效应，目的在于对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以及中期生产率和增长率这样的总量指标作出阐释。评估表明，根据特定的国家因素和政策响应情况，增加援助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中期影响，而对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汇率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控制的。

该框架旨在获取受援国面临的关键宏观经济问题。首先，更大的外贸部门有利于生产率更快地增长。这是因为可能存在“边干边学”效应，或者称为外在效应，即参与出口市场竞争的企业可以进行学习（例如学习制造和管理技术），而学到的知识和技术会溢出到其他企业。外贸部门的这种特殊作用意味着，援助涌入所带来的实际汇率上升可能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其次，公共资本在生产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投资支出能直接或通过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鼓励更多的私人投资）来间接提高产出。然而，公共投资支出并不总是有效的，同时并非所有的政府投资支出都能成为有用的公共资本。再次，从政策前沿来看，在该框架下，对大量援助涌入既可以采取财政支出的应对方式，也可以采取积累外汇储备的应对方式，这样就使得多种政策组合成为可能。该框架将援助资金的运用（这是由财政当局控制的）和援助资金的吸收以弥补高额经常项目赤字（其受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政策的影响）两种方式区分开来。

将该模型用于特定案例需要“校准”——使用可获得的实证数据来对决定模型行为的参数赋值。例如，借助于“边干边学”的外部效应就可以进行企业和部门层面的分析。研究还对公共投资的效率和回报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估计。但是，可获取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填补信息空白需要进行大量的判断。更加常见的情况是，该模型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完整的，仅靠模型本身是无法给出准确的预测结果的。但是“格伦伊格尔斯援助规模扩大情形分析”项目显示，这种模型有助于理清思路，提供一种系统地整合各种实证证据的方法，并提供一种很有用的工具，使人们能清晰观察到各种援助规模扩大情形的生成，并可以将各国的结果进行比较。

关于援助的经验教训

虽然该模型对于不同国家包含了特定的国家因素，但在将其应用于各个国家的过程中还是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相信这些教训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

首先，将来源于援助资金的公共投资的效率和公共

投资的历史效率区分开来很重要。我们发现，相对于以往的投资效率，援助资金支撑的公共投资的效率决定了这类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援助资金相关的投资水平较低意味着援助将仅带来少量的额外公共资本。但历史效率低也意味着初始公共资本很少，所以即使公共资本的少量增加也可以对产出产生重大影响。

这一结果隐含的意思非常有趣。如果一个国家在将投资支出转化为有用的资本方面遇到许多麻烦——换句话说，历史投资效率和与援助相关的投资效率都很低——这可能不会对给定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影响。但如果一国的投资效率随着援助涌入而降低（例如，因为该国无法管理大规模的援助）或提高（例如，该国或援助国改进了管理实践），这一比率就很重要了。

第二，通常，援助涌入会自然而然地引发实际汇率的上升以及外贸部门规模的缩小。这些变化将资源从目前国际竞争力变弱的外贸部门转移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非外贸部门。换句话说，这种货币升值将资源置于国内生产部门，同时有利于进口急需的资本品。而即使伴随着援助资金投入使用，本国货币出现升值，同时外贸部门规模缩减，结果却带来了更高的公共资本积累、更多的私人投资以及更高的产出。

但是，实际汇率上升引发了人们对感染“荷兰病”的恐惧，即由于实际汇率上升所相应造成的外贸部门收缩可能损害整个经济的增长，原因是通过国际竞争和出口产生的学习效应减少了。

这种学习产生的外部效应并不一定会使得援助变得有害。不过它却会助长援助效率所产生的效果——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援助资金的投资效果很好，外部效应会提高外贸部门的生产率，因此援助在增长方面可以产生更大的收益——形成我们所说的“荷兰力量”。如果援助资金的投资效果不好，外部效应使生产率相对于无援助时的基准生产率出现下降，这种情况下，援助确实会损害经济增长。本文的图说明了这一结论。该图比较了在不同的公共投资效率下，当存在与外贸部门相关的中等程度的正外部效应（左图）和存在强烈的外部效应（右图）这两种情况下援助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该图假定援助平均以相当于GDP 6个百分点的数量短暂但持续地增加，并在随后五年里逐步下降到之前的水平。此外，还假设援助涌入被完全支出和吸收。

在中等程度的外部效应下，这可能与标准的企业层面研究的结果一致，援助涌入引发了更高的增长率——相对效率更高时更是如此。当外贸部门对生产率提高尤为重要并且援助资金得到有效使用时，我们就看到了“荷

兰力量”。更高的公共资本积累引发了更高的私人投资，这最终有助于使外贸部门的产出在实际汇率上升的情况下仍然提高到超过其通常情况下的产出水平上。外贸部门的这种更高的产出放大了公共和私人资本投资的正面中期效应。另一方面，当援助的使用效果很差时，强烈的外部效应导致GDP在短期内下降，而GDP下降会冲击外贸部门，使其丧失竞争力。外贸部门生产率的增长也因而下降。同时，由于缺乏大规模的新增公共资本，私人投资无法实现增长，这样，投资和生产率也无法得到改善。在这种“荷兰病”的情形下，援助实际上反而使增长率下降。

第三，对竞争力和实际汇率上升的关注已经频繁引起政府将流入的一些援助资金作为国际储备积累起来，而同时仍然从本国货币中支出与这些资金对应的金额（见Berg等，2007）。通过一直持有与援助相关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降低了外汇市场上外国货币的供给，从而减轻了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但是持有外汇储备这种做法会将私人消费和投资挤出，从而损害中期增长。这种挤出效应的原因是试图将同样的援助资源使用两次。当政府从本国货币中支出与援助资金对应的金额，美元援助资金可以被用于买断（消除）这次货币供应，从而为支出提供资金。如果美元援助资金保留在储备中，那么中央银行就需要另外发行债券而销售这些债券等于为支出筹集资金，从而产生相应的挤出风险。

第四，在影响外贸部门生产率的低效率和强烈外部效应的环境下，虽然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但将援助资金的一部分积累到储备中可能是合理的；但还有更好的选择。在此类环境下，援助对增长不利，而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可以缓解本币升值和外贸部门产出缩减这些“荷兰病”类型的效应。这种政策远远弥补了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但是，应对援助涌入问题还有更好的对策。采用外汇储备积累政策的同时，可以将援助资

金进行部分支出。而如果援助资金得到更有效的使用，或者更多地用于有利于外贸部门的投资，则援助扩大的GDP效应将总是正面的——如果政府不将援助资金用于外汇储备的积累则效果会更好。

自然资源

本文中所描述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对其他类型的资源涌入进行分析，包括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那些情况（与援助不同）。自然资源的发现有许多与援助共同的特征。通常，对发达国家关于发现自然资源的分析假设该国总是可以通过借贷为公共投资筹集资金，因此这种投资和资源发现之间没有关系。但这种联系在受到信贷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非常关键，并且通过使用本文描述的模型中的一个变量已经对这种联系进行了分析（见Dagher, Gottschalk和Portillo, 2010）。同时，许多国家正在考虑更多地使用非优惠的外国贷款来为所需公共投资筹集资金。后续工作是修订这一框架，以研究这一问题以及可能随之产生的债务可持续问题。■

Andrew Berg是IMF研究部助理主任，Luis-Felipe Zanna是该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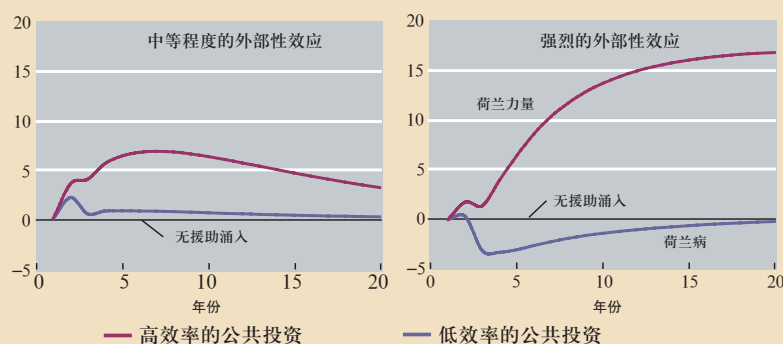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Arndt, Channing, Sam Jones, and Finn Tarp, 2009, "Aid and Growth: Have We Come Full Circle?" Discussion Paper No. 09-22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Berg, Andrew, Shekhar Aiyar, Mumtaz Hussain, Shaun Roache, Tokhir Mirzoev, and Amber Mahone, 2007, The Macroeconomics of Scaling Up Aid: Lessons from Recent Experience,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25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erg, Andrew, Jan Gottschalk, Rafael Portillo, and Luis-Felipe Zanna, 2010, "The Macroeconomics of Medium-Term Aid Scaling-Up Scenarios," IMF Working Paper 10/160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Collier, Paul, 2006, "African Growth: Why a 'Big Push'?"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 15, Supplement 2, pp. 188-211.
- Dagher, Jihad, Jan Gottschalk, and Rafael Portillo, 2010, "Oil Windfalls in Ghana: A DSGE Approach," IMF Working Paper 10/11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Rajan, Raghuram, and Arvind Subramanian, 2008, "Aid and Growth: What Does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Really Show?"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0, No. 4, pp. 643-65.
- , 2010, "Aid, Dutch Disease, and Manufacturing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thcoming.

当援助涌入时经济增长发生了何种变化？

当出口推动生产率提高时，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

（实际GDP，由于占GDP 6%的援助涌入造成的相对于基准的偏离程度）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模型模拟结果。